

## 英国与早期“西藏独立”形象的塑造

赵光锐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人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热情不仅是政治因素和媒体宣传的结果,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即一种历史上形成的“西藏独立”形象。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为实现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政治目的,在文化和观念上精心制造了这一虚假形象,并通过占霸权地位的文化传播系统在全球加以扩散和传播。“西藏独立”形象强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认知和想象。辨清和破除英国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制造的种种关于西藏的虚假形象和观念是国内学者极为艰巨的一项学术任务。

**关键词** 国别与地区政治 中英关系 西藏问题 香格里拉神话

近年来,“西藏问题”成为中西关系中的热点甚至敏感问题。当代西方人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热情不仅是政治因素和媒体宣传的结果,还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在美国接手“西藏问题”之前,英国人就早已在政治上制造了“西藏独立”问题,在文化和观念上制造出种种对西藏的误解和偏见。后者的集中体现就是一种“西藏独立”形象,这包括:在地理上,西藏是封闭、神秘和无法进入的禁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西藏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和尔虞我诈;藏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贵贱,男女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sup>①</sup>在政

\* 赵光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是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藏独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形态》(立项批准号09BGJ003)的阶段性成果。《国际政治研究》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感谢,当然,一切文责概由笔者自负。

① 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西藏神话化的背后》,《中国民族报》2009年8月14日。

治上,西藏一直是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独立王国”,却与英印政府有密切友好的关系,尤其是1911年以后,西藏维持了近40年的“事实独立”状态。总之,西藏是一个神话般的“独立王国”——香格里拉,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东西。

在英国殖民势力出现在喜马拉雅地区之前,西方人就已有许多关于西藏的误解和幻想,主要倾向是将西藏的形象妖魔化。<sup>①</sup>但真正把西藏的各种虚假形象系统化和神话化,并使之在西方大众化和流行化起来的却是英国,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开始,为了政治目的,英国开始描述和宣传西藏的“正面和积极”形象,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逐渐从妖魔化转变为神话化。<sup>②</sup>更关键的是,英国为西方人制造了西藏的政治形象——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一个纯汉人的国家)的“西藏国”形象,同时把中国在西藏的形象负面化,使西藏与“中国”、西藏人与“中国人”的形象完全对立起来。英国人将西藏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揉和在一起,通过占霸权地位的文化传播系统在全球加以扩散和传播,强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西藏认知。<sup>③</sup>英国人塑造的西藏在文化上的“香格里拉”形象与政治上的“独立”形象是相辅相成的。这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对西方人而言,“西藏呈现这样一幅景象:西藏人幸福和平地生活着,只关注于佛教;这是一片遥远而生态和谐的土地,却被邪恶的力量侵略了。这与巴勒斯坦、北爱尔兰等问题完全不同。一些人不断地鼓吹‘西藏神话’,因为没有这一‘神话’,中国对西藏的占领就不过是众多侵犯人权事件中的一件而已”。<sup>④</sup>

## 一、英印殖民当局塑造“西藏独立”形象的手段和方式

在塑造“西藏独立”形象的过程中,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和英印边境官员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时刻关注和审查从印度“输出”的各类西藏信息。他们发布和制造信息,也为各类宣传和报道提出标准;他们影响媒体和学术机构,使其报道

---

① 从接触和了解西藏的初期到19世纪末,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主要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西藏的佛教是堕落、腐朽的一种宗教,人们的生活也是怪异难懂,西藏人如同妖魔。例如,他们认为西藏人喜欢用头骨做酒器,用人骨做乐器,与鬼神相通等等,这在西藏是普遍现象。在西方人早期关于西藏的作品中,这些怪诞离奇的描述比比皆是,很多甚至故意夸大和虚幻西藏的这类怪异形象。参见沈卫荣:《简述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以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妖魔化形象为中心》,《西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2000年版。

② 所谓“神话化”,是指将西藏描述成“人间天堂”,西藏人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和平、幸福、智慧,在西藏没有邪恶和苦难。这又完全与“妖魔化”相反,也就是将西藏“理想化”,而不考虑西藏真正的社会现实。“神话化”的问题也可以参考沈卫荣的文章,本文第一页的注释一。不管是妖魔化还是神话化,都是西方人自己的精神虚幻,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大关系,当代很多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就停留在这种虚幻的状态中。

③ 英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在文化上占据着“霸权地位”,也就是拥有“文化霸权”,英国的信息传播手段如报纸、广播、刊物和文学作品等,在当时都具有一种“霸权地位”。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英国在获取和传播有关的西藏信息方面也处于主导地位,可以称之为对西藏的“文化霸权”。

④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1.

和研究与英印政府保持一致。在涉及西藏的“独立地位”、西藏制度的“美妙”、英国在西藏的“良好声誉”和中国在西藏的负面形象等方面,寇松(Curzon)、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贝尔(Charles Bell)、古德(Basil Gould)和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等人的众多作品,前后相承,保持着高度一致。经过英印殖民当局长期不懈的“努力”,“西藏独立”形象出现并植根在西方人的观念和心理中。如杨公素先生所言,“为实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英国人制造出许多否认西藏属于中国的谬论,从所谓‘宗主权’、‘独立’到‘自治’等,并通过他们的传播工具,出版鼓吹这些谬论的书刊,以混淆世人视听,其用心之深、手段之诈、危害之大,至今仍令人警惕”。<sup>①</sup>

### (一) 塑造西藏的政治形象

英印殖民当局的首要目标是塑造西藏的“政治形象”:一个自古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西藏独立国”。“英印殖民地官员要制造一种西藏的历史形象以服务于英国和在拉萨的盟友……最重要的是把西藏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西藏是一个独立、强大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并是印度的友好邻邦。”<sup>②</sup>因此,他们反复强调西藏的“孤立”和“独立”。但是,西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无法否认的,他们就倾尽全力,详举“事实”来证明这种联系在“现在”已经完全衰弱或消失了。他们尤其不遗余力地向读者展示,西藏“已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这种手法在贝尔的经典1924年的《西藏之过去和现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sup>③</sup>

除直接说明和描述西藏自古享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外,他们还多从自然环境的封闭性,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独特性上证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对西藏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描述时,他们并不深入研究其真正的独特性何在,而是通过与“汉人”或“中国人”的对比来说理。这就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西藏独立于中国。”<sup>④</sup>

摄影也被英国用作塑造“西藏独立”形象的手段。摄影作品直观生动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文化和人类学上,西藏与“中国”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贝尔、古德和黎吉生都认为摄影作品是证明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的重要视觉证据。1944年,负责不丹、锡金和西藏事务的政治官员古德将其在西藏拍摄的照片在伦

①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Richmond: Curzon, 1997, p. 208.

③ 尤其是“中国在西藏”一章,参见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 1990, pp. 208-209.

④ 如黎吉生的“经典”《西藏历史》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描述, Hugh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Boston: Shambhala, 1984, pp. 4-20.

敦展出,观众包括英国情报处、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的代表。一位成员说:“让美国人看到这些关于西藏的照片会极有好处,这会让他们确信,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sup>①</sup>英国人的很多摄影记录了他们与西藏官员、贵族、活佛等的交谈、会晤、宴会等活动。它们让人感到,“拉萨是一个英印殖民政府的精英与具有相应级别的西藏贵族和宗教领袖们聚会的地方”。<sup>②</sup>它们还能给公众这样的印象:英印政府与西藏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也极为密切友好、欢畅融洽。

## (二) 美化英国的殖民政策,丑化中国形象

英印政府也美化英国的殖民政策,强调西藏与英印政府“密切友好”的关系。负责西藏事务的英印官员大多通过“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告诉西方人:西藏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强大友好的英国支持热爱自由的西藏,残忍的中国人则压迫善良的西藏人。他们试图在西方公众面前淡化、贬低、隐匿和消除中国在西藏的权威和主权;扭曲中国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尤其是政治上的关系。

寇松在1903年宣称:“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个宪法上的杜撰,一个政治上的虚饰,其所以能维持只是双方都感到便利。”<sup>③</sup>这成了早期众多西方人描述中国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标准版本”。1904年侵藏的主要人物荣赫鹏,在其《印度与西藏》中提醒西方人“西藏并不孤立”。他列举了众多印度与西藏互动的事例,证明“西藏从未真正孤立过”。<sup>④</sup>他却只字不提西藏地区与中国间的互动和联系,这本来是“西藏从未孤立”的最大证据。他误导读者,使其以为西藏只与印度有着“高度地互动”和友好密切的联系。

在贝尔的众多作品中,一个鲜明特点是几乎所有涉及中国人的事情都是负面的,<sup>⑤</sup>既包括他自己“见证”或认为是负面的事情,也包括他“听到的”藏人对“中国人”的各种负面评论和看法。他不断强调,自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好友”,“西藏人尊重英国人”。他如此评论1904年英军侵藏:“公正地说,这次考察和我们军队的行为给西藏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征用的物资,我们付给西藏人报酬并且价格公道,这让他们非常吃惊。我们医治受伤的藏兵,这更让他们认为我们非同

---

① R. Peel to Gould 30 Aug 1944 L/P&S/12/4180 OIOC, quoted from Peter Hansen, “Der tibetische Horizont: Tibet im Kino des frühen 20. Jahrhunderts,” in Thierry Dodin und Heinz Räther, hrsg., *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Köln: DuMont, 1997, S. 99.

② Clare Harris, “Seeing Lhasa: British Photographic and Filmic Engagement with Tibet 1936-1947,” in Clare Harris and Tsering Shakya, eds., *Seeing Lhasa: 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 Chicago: Serindia, 2003, p. 10.

③ 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④ Francis Younghusband, *India and Tibet*, Delhi: Oriental Publishers, 1971, pp. 2-3.

⑤ 贝尔被认为是“西藏通”,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对西藏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作为英印殖民地官员,他“职业生涯的最后21年几乎全部都是在西藏和西藏边境渡过的”。Charles Bell, *Der Große Dreizehente: Das unbekannte Leben des XIII. Dalai Lama von Tibet*, Bergisch Gladbach: Lübbe, 2005, S. 34.

一般。英国军官没有毁坏寺庙和干预寺庙事务。与后来中国人的侵略相比,西藏人对我们的考察充满了好感。”“相比来说,英国人像一只青蛙,而中国人则是蝎子。西藏人认为青蛙是一种比较有力量、有跳跃的习惯和温和的外表,蝎子则极为残忍。西藏人有一句老话:‘见过了蝎子,就知道了青蛙的美丽。’”<sup>①</sup>贝尔把英国的侵略轻描淡写地称为“考察”,并厚颜无耻地进行美化和吹嘘。英国官方文件和众多作品一般都把这次武装侵略称为“荣赫鹏考察”(Younghusband Expedition)或“荣赫鹏任务”(The Younghusband Mission),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延续了这种说法。贝尔还生动形象地告诉读者,西藏人认为英国人“有力量”而“温和”,中国人则很“残忍”。1940年,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到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贝尔根据参加典礼的古德的描述<sup>②</sup>评论道:“吴先生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除了献上一块哈达(什么也没有做),其他人也都是献上一块哈达,英国代表也是如此。”<sup>③</sup>他故意隐瞒事实告诉读者:中国代表参加典礼“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没有什么不同”。

### (三) 掩饰西藏阴暗面

英印另一项政策是,尽量减少和避免对西藏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评,即使某些官员对西藏有所批评,但也不能将这些观点公开;赞扬和尊重西藏的制度,旨在博取西藏上层的好感,培育和增强西藏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贝尔对这一政策阐述是:“在不时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应尽力把西藏人一方展示给公众。尤其是当许多错误陈述出现在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媒体上时。人们自然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西藏人富有侵略性并且是一个奴隶制的民族——尽管几乎所有已经发生的侵略和奴役都来自中国。”<sup>④</sup>因此英印的官方文件和“西藏通”们的著述,基本没有对西藏制度的负面评价,而是在努力营造西藏的积极形象。

黎吉生在《西藏历史》中谈到:“西藏社会被严格地划分成上等和下等阶层、贵族和普通人。在这种明确的等级划分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西藏宗教制度也有相似的等级划分。用今天的标准看,这种制度可能显得过时了,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是残酷的。这应该由其效果来评判。……西方旅行者从17世纪开始就描绘西藏人是随和、善良、欢乐和宽容的。这都与现在的看法矛盾:藏人一直被践踏、压迫和剥削。需要强调的是,(西藏)1300多年的历史中,虽也有不满和

①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p. 69-70.

② 事实上,“及达赖坐床典礼举行之日,古德因座位问题未出席”。参见《吴忠信奉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 吴忠信 赵守钰 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③ Charles Bell, *Der Große Dreizehente*, S. 559.

④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 268.

反抗,但却没有总体上的反抗——针对政府的普遍起义。可以肯定的是,西藏人接受他们长期建立的生活方式。”<sup>①</sup>在一篇以亲身经历见证“西藏独立”的文章中,他说:“我并不想在道德的基础上评判那种制度。几个世纪以来它都一直运转正常,也未产生过任何极端困难。土地能生产出足够的衣食,西藏人的生活很容易,也很快乐。”<sup>②</sup>在其他英印官员的作品中也有许多这种充满矛盾和复杂心情的评论。他们内心确实感到西藏制度落后,但为了“政治使命”,又不想过多提及和批评西藏的阴暗面。他们把西藏人的性格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与西藏总体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以西藏人本身的质朴、善良、宽容和微笑来说明西藏制度的优点。英印政府认为,要使西藏成为一块稳定可靠的缓冲区,首先要保证西藏制度能“一直运转正常”。西藏既不能太强大也不能太虚弱,尤其是内部的动乱和虚弱会给中俄带来可乘之机。在保持封闭和稳定上,西藏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是英国人异常尊重西藏制度的真正原因。

#### (四) 精心控制经由印度的入藏人员

旅行和探险者是西藏信息的重要提供者,英印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有效控制。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印政府规定,所有从印度入藏的旅行者的作品都要送交印度殖民地政府审查。<sup>③</sup>以此确保有关西藏的所有信息都能处于英印当局的控制之下。1911年后,印度几乎成为入藏的唯一通道。1940年吴忠信取道印度入藏,他注意到:“锡金为入藏孔道,英人在其中途绒坡桥设有检查所,无照者不准通过,此即其封锁政策之执行地也。”<sup>④</sup>经英印政府允许,旅行者可从大吉岭、葛林堡入藏,在亚东到江孜间旅行,如果西藏政府允许,可向拉萨前进。入藏控制权成了英国对华交涉西藏事务的重要筹码。贝尔说:“我们不应承认中国在控制西藏内部事务上的任何权力。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通过拒绝中国官员经锡金入藏来施加压力。……拒绝中国人通过,这已经证明是一件很有力的武器,尤其是当西藏人阻止中国人从东部边界入藏时。”<sup>⑤</sup>

总体上英印政府总能使他们偏爱的人员入藏而排除那些“异议”人物。西方人入藏的首要困难是西藏当地政府对边境的严密控制和对外国人的强烈排斥。但经一些与西藏政府“关系良好”的英国官员努力,很多西方人“有幸”获得了入藏机会。这些人并非靠运气,而是被认为“适合”进入西藏。对英印官员们来说,理想

① Hugh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p. 15.

② Hughe Richardson, “The State of Tibet,” in Hughe Richardson, ed., *High Peaks, Pure Earth*, London: Serindia Publ., p. 680.

③ OIOC L/P&S/lo/lo/loII-3605, *Indische Regierung and India Office*, 5. 9. 1923.

④ 《吴忠信奉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1940年6月)》,第140页。

⑤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 148.

类型的旅行者是：他们的性格和行为能提升欧洲人的声誉，其旅行能以某种方式增进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帕·图奇（Giuseppe Tucci），20世纪20—40年代几次入藏考察，获得了英印官员的欢迎和帮助。官员们承认，根本原因是“图奇的研究对我们主要的政策目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政策目标是：西藏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民族”。<sup>①</sup>

英国一般不愿非英人士入藏，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的人大多不认同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即使他国旅行者获得了入藏机会，许多问题也要依靠英印政府，如雇佣向导和服务人员、使用驿站和邮政系统等。这些都由英印当地官员来安排，他们可以对旅行者进行监视。一旦发现不利于英国的情况，他们会采取各种方法消除影响。1939年，德国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äfer）考察队到西藏考察，这是近代唯一被允许进入拉萨和西藏文明发源地山南雅砻河谷的西方考察队。<sup>②</sup>在拉萨，英国人严密监视德国考察队的一举一动。黎吉生在德国人雇佣的服务人员中安插了间谍；他可以监控所有发往德国的邮件，因为德国人必须使用英印的邮政系统；黎吉生向古德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毁坏英国的声誉，他们告诉西藏人，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在西藏没有赢得多少朋友；僧侣向他们扔石头，因为他们在庆典时明目张胆地拍照；他们宰杀动物并粗暴对待雇佣人员。黎吉生认为，“德国人的考察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给拉萨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相反却提高了我们的声誉。”<sup>③</sup>舍费尔的作品一直未译成英文，外界关于此次考察的信息主要来自印度事务部和英印边境官员，所以被广泛认为是纳粹任务，并被赋予了太多的神秘色彩。<sup>④</sup>有美国学者认为，希特勒让舍费尔带了一群喇嘛回德国，让他们举行特殊的法事来改变天气，为入侵苏联作准备。<sup>⑤</sup>俄国学者认为纳粹试图在西藏寻找“地球轴心”，“想使时间倒流，以避免在苏联战场上所犯的错误”。<sup>⑥</sup>这些都不符合事实，甚至是天方夜谭式的传闻。

① OIOC L/P&S/12/4247, Gould to E. P. Donaldson (India Office), 6 April 1946.

② 关于此次考察参见 Ernst Schäfer, *Das Fest der weißen Schleie*, Durach: Windpferd, 1988; Ernst Schäfer, *über den Himalaya ins Land der Götter*, Durach: Windpferd, 1989; Reinhard Greve, “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 in Thomas Hauschild, hrsg., *Lebenslust und Fremdenfurcht: 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Christopher Hale, *Himmler's Crusade: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38 Nazi Expedition into Tibet*, London: Bantam, 2003.

③ OIOC L/P&S/12/4165-7795, Lhasa Mission Report, October 1938-October 1939, by H. Richardson, in Gould to India, 24 October 1939.

④ Isrun Engelhardt, “The Ernst-Schaefer-Tibet-Expedition (1938-1939): New Light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lex McKay, ed.,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London: Mayer, 2003.

⑤ Lee Feigon, *Demystifying Tibet: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the Land of the Snows*, Chicago: Dee, 1996, p. 15.

⑥ [俄]格奥尔吉·佐托夫：《希特勒的西藏计划》，《参考消息》2004年6月23日。

## 二、官民并举：从科学考察到文学作品的虚构

早期英国殖民者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科学考察和文化远征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英国人早期对“西藏独立”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对英印政府塑造“西藏独立”形象进行了密切配合，文学作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一）英国科学机构对西藏的考察和研究

在塑造和传播“西藏独立”形象方面，英国的一些科学研究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早期，英国主导着西藏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它在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进行帝国的扩张，所有相关的研究都要为这一中心服务。”<sup>①</sup>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西藏考察和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协会的目标是了解世界并清楚地将世界绘入地图。”<sup>②</sup>首要工作是支持和资助英国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察探险，最初的重点是非洲。19世纪末，英俄在中亚的角逐日趋激烈。1899年寇松成为印度总督，主张对西藏采取积极的“前进政策”。配合这种形势，协会的重心也转向中亚和西藏。1891年始，协会每年（除1895年）都资助在喜马拉雅和中亚的考察。1889—1897年的九年间，八位探险者因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考察而获得了皇家地理协会奖章。<sup>③</sup> 协会对西藏考察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协会与英印政府有密切合作，一些在藏有重要经历的英印官员都与它有密切关系。荣赫鹏在1890年因“1886—1887 穿越中亚的旅行”被皇家地理协会授予“开拓者奖章”，1919年他成为该协会的主席。1921年，他建立了珠穆朗玛峰委员会，积极组织对珠峰的攀登和考察。1895年，由于“波斯历史、地理考古和政治的著作；在法属印度与中国边界的旅行；在兴都库什、帕米尔和阿姆河的考察”，寇松获得了“庇护者奖章”，<sup>④</sup>他长期担任皇家地理协会的副主席。协会充当英国侵略西藏的先锋，提供地理、社会的信息和情报；政府则把某些情报优先透露给协会，并为考察提供政治和武力支持。英印政府利用某些官员与西藏上层人物的“良好私人关系”支持西藏考察。1920年，贝尔出使拉萨，协会和登山俱乐部（Alpine Club）提出，让西藏政府允许他们攀登珠峰，因为尼泊尔政府一直拒绝他们从南侧攀登。

①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London: Athlone, 1989, p. viii.

② T. Freeman,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E. Brown, ed., *Geography: Yesterday and Tomorrow*,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③ "Award of the Royal Preminums," i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RGS Years-Book and Record*, London: Savile Row, 1898, pp. 210-213.

④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RGS Years-Book and Record*, pp. 210-211.

贝尔说,他可通过书信告知西藏政府此事,在他的记忆中“西藏政府还没有拒绝过他通过书信提出的要求”。但他又认为书信难以讲清问题,即使西藏政府同意,也会增加不信任和疑虑。于是在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谈话时,贝尔以“私人方式”提出请求,获得了同意。<sup>①</sup>

皇家地理协会和《泰晤士报》等配合印度事务部对西藏信息和作品进行审查。由协会资助的西藏探险者,他们的作品都必须送交协会审核和修改。1937年,英国旅行者斯宾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曾进入拉萨,他向协会提交了一篇旅行报告。协会秘书亚瑟·辛克斯(Arthur Hinks)删除了报告的某些部分,提交给印度事务部审查。印度事务部做了进一步删改。辛克斯确信,印度事务部“删改那些部分是完全正确的”。<sup>②</sup>

皇家地理协会的刊物《皇家地理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是欧洲人获取西藏信息的权威性来源。“它的每一期都蕴含着宝藏,通过协会刊物,地球上那些遥远的角落成为焦点,并第一次在科学的光辉中获得了评估。”<sup>③</sup>人们把它当做纯粹的科学杂志,认为它刊载的都是客观和不带政治色彩的西藏信息。实际上,协会的所有出版物都由英印政府批准,发布的西藏信息都经印度事务部审查,并随时听取英印边境官员的意见。协会刊物配合英印政府,褒扬那些有利于英国的作品,对“不和谐声音”进行批评和压制。“拥有叙述的权力,或者阻止其他人产生另类的叙述,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者来说极端重要。”<sup>④</sup>在“叙述”西藏时,英国也拥有阻止和消除“另类叙述”的权力。1923年,美国旅行者麦克格文化装进入拉萨,六周后被驱逐。他的游记和文章被广泛传播,透露了许多不利于英国的信息。英印政府认为,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宣称拉萨有一个支持中国人的派别,支持中国而反对英国。他透露:“大吉岭是英印政府通过赎买的办法从独立的山地小国锡金获取的。”<sup>⑤</sup>这也让一直隐瞒此事的英印政府极为恼怒。驻锡金的政治官员贝利(Bailey)告诉协会秘书辛克斯,要他组织文章,对麦克格文的“可信赖性”和声誉进行攻击。《皇家地理协会杂志》1924年第2期的文章说:“麦克格文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所仅有的一点价值也因此大大折扣;他的行为极大伤害了英国与西藏的友好关系。”<sup>⑥</sup>一些英印边境官员的著作对麦克格文的

① Charles Bell, *Der Große Dreizehente*, SS. 332-335;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p. 183-184.

② Alex McKay, “Wahrheit, Wahrnehmung und Politik: Die britische Konstruktion eines Bildes von Tibet,” in Thierry Dodin und Heinz Räther, hrsg., *Mythos Tibet*, S. 36.

③ Karl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Washinton: Counterpoint, 1999, p. xxi.

④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p. xiii.

⑤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4, pp. 408, 13.

⑥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p. 106.

作品充满了贬损。1946年,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称麦克格文的书是一本“惊险小说”。

塑造西藏形象时还要对文本进行选择 and 评估,以创造一个“特殊的、人们渴望的西藏形象”。“通过选择和鼓励某一风格的旅行作品,同时排斥其他类型,英国人把他们制造幻想的权力运用到了喜马拉雅和西藏。”<sup>①</sup>有关西藏的作品面临来自皇家地理协会的压力。1811年,英国的曼宁曾到拉萨,1871年,他的旅行日记出版。但这些早期的文本已不符合人们的口味,也无法让读者接受它所描述的西藏形象。协会的编辑人员认为,“这些日记缺少生动的描述和激动人心的偶然事件,因此无法让人感到愉悦。它应该有更多对原始的高山风光的描述”。<sup>②</sup>这成为评判西藏旅行作品的主要标准,是无形的压力。通过鼓励这类风格的作品,协会使西方读者具有了相似的口味和审美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体现西藏那些“为人熟知”的特征:孤立、圣洁、神秘和美好,它就不会受到喜爱和赞赏。因此,后来许多西方的西藏作品,越来越呈现强烈的虚幻和想象色彩。

## (二) 文学作品与“香格里拉”的出现

英印当局塑造了西藏的政治形象,而英国小说家塑造了西藏的文化形象:一个遗世独立、神秘莫测、充满智慧、没有战争、人人幸福、时间停滞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英国两部以西藏为题材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son*)和《第三只眼》(*The Tird Eye*),对塑造和传播“神秘的”、“神话般的”西藏形象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欧洲最早以西藏为题材的小说是1910年英国出版的《在喇嘛的土地上》。<sup>③</sup>真正使西藏进入西方人视野的,是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3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它赋予西藏浓重的神话色彩,将西藏神话化,并为英语世界创造了“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词。“香格里拉”在西方文化中几乎获得了与“伊甸园”等同的社会文化含义。英国小说家的这种创造性和影响力是当时英国文化霸权的一个集中体现。沈卫荣教授深刻分析了这部小说如何将西藏神话化。<sup>④</sup> 本文重点考察《第三只眼》的影响。

《消失的地平线》将西藏神话化,而《第三只眼》完全将西藏神秘化。1956年,《第三只眼》在英国出版。作者洛桑·然巴(Thuesday Lobasang Rampa)一再宣称,此书是本人真实的自传故事,但因明显有太多虚构的成份,出版社不得不把它当小说出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前18个月就卖出30万册。欧洲的藏学家们却

①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p. 73.

② Ibid., pp. 74-79.

③ Edward Amundsen, *In the Land of the Lamas. The Story of Traschi Lhamo, a Tibetan Lassin*, London/Edinburgh, 1910.

④ 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西藏神话化的背后》。

很生气,称“这是一部厚颜无耻的书”,是一个“野蛮的捏造和对西藏及宗教的标签化”。连大力支持“西藏独立”的黎吉生都批评说:“任何在西藏生活过的人,读上几页就会感到,这本书的作者肯定不是西藏人。”<sup>①</sup>事实也是如此。作者是英国人,从未到过西藏,除后来移居都柏林,甚至从未离开过英国。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然巴的西藏喇嘛。他的使命是“为世界保存西藏的智慧”。童年时,他每天都要在学校修习法律,“这些法律对富人是严厉的,以使他们能有同情和公平之心;对于穷人是宽和的,以向他们显示怜悯之心。”然巴具有众多的神异本领,如飞行等。然巴八岁时,在额头之上、两目之间有了第三只眼,能洞察一切,可看穿人的欲念和虚假。一次,达赖喇嘛让他在夏宫用第三只眼观察中国来的“使节”,以了解中国人的意图。然巴观察后认为,“中国人充满仇恨,人们全都致力于物欲和恶行。”后来达赖喇嘛又让他观察一位英国客人,然巴认为,“他虽然健康不佳,但满怀帮助西藏的真诚。”并预测:“这个人的名字叫查理斯·贝尔。”<sup>②</sup>故事虽然荒诞,许多情节却来自英印边境官员和探险者的作品,表现出相似的倾向性,即西藏神秘莫测,社会制度极为美妙,英国是西藏的朋友而中国是敌人。

许多人把《第三只眼》的内容当作事实。美国藏学家洛佩兹曾举例说明此书的影响。他在密歇根大学开设讲座,让藏学专业的研究生读了《第三只眼》,读后他们都大加赞赏。尽管前六周他们一直在读西藏历史和宗教的文献资料,包括斯坦因(R. A. Stein)的《西藏文明史》(*Tibetan Civilization*),但却认为《第三只眼》内容的真实性无可指摘,比之前看过的任何关于西藏的作品都更为真实。洛佩兹教授道破此书作者的真实身份后,“他们极为震惊,但立刻想把小说中的事实分离出来”。<sup>③</sup>连藏学专业的研究生们都无法辨别其内容的真伪,更何况是那些普通读者。

这两部迄今最有影响的以西藏为题材的小说皆出自英国人之手并非偶然。到20世纪30年代,英印边境官员、科学机构和探险者已为小说家提供了广泛大量的素材。英国小说家们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材料散发的口味和偏好,利用丰富的想象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使之流行起来,成为时尚。小说家只需从众多材料中抽取一点“事实”,以营造小说的真实氛围。有了这种真实氛围,他们的想象和虚构在读者头脑中也将转化为事实。萨义德说:“某种程度上,英国众多的殖民地小说所起的作用,是使某个遥远的地方广受欢迎和流行,或者使它不受欢迎。”<sup>④</sup>西藏“幸运”地成为英国小说家们愿意让它流行起来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小说家对西藏虚假形象的塑造,比英印官员和探险者们更为有力和深入人心。

①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p. 97-98.

② T. Lobsang Rampa, *The Tird Ey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4, pp. 24, 88, 175, 89.

③ Donald S. Lopez,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 104.

④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78.

### 三、英国的文化霸权及其政治目的

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确立了全球统治地位的殖民体系,与之相伴相生的是文化霸权。“英国人发展出一系列与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在维护和扩张殖民帝国时不需耗费太多物质和经济资源。”<sup>①</sup>知识、观念、观点和信息不是自然产生的,是“被制造”(made)出来的,是人的意图、偏好、社会历史环境和制度的产物。<sup>②</sup>在所谓“英国殖民霸权”时代,英国也是制造知识和观念的主导力量。关于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知识和观念,大部分要有英国这个“当事人”来提供和制造,这要服务于殖民地的控制和新领土的扩展。利用科学、文化和社会心理手段推进殖民统治和扩张,往往会收到军事和政治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在觊觎中国西藏地区时,英国人也同样运用了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手段,运用了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

#### (一) 英国殖民者确立对西藏的文化霸权

在印度的长期统治和对喜马拉雅地区的不断渗透,使英国在获取和传播西藏信息方面拥有其他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英国对西藏信息有着迫切需要,因为在喜马拉雅地区殖民统治的维持和扩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报的搜集和使用。最早到西藏的英国人博格尔(1774年),就是一面商谈贸易关系,一面为孟加拉总督搜集西藏情报。包括西藏的地理、路线、资源和市场潜力;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所有关于当地居民、宗教、生活方式、道德等的信息。其后的曼宁和特纳也负有同样的使命。<sup>③</sup>英国在西藏亚东、江孜和噶大克设有商务委员并驻军,1936年在拉萨设立了代表处。1920年贝尔出使拉萨后,建议英印政府将电报线从江孜延长至拉萨,这样拉萨与新德里间的通讯一日便可往还。1934年,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册封并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事毕他取道印度回国,观察到:“由江孜至哲孟雄都城江都(甘托克),共设有驿站十一所,每站设电报、电话,与印度互通声息。观此可见英人对藏交通上计谋之周到也。”<sup>④</sup>吴忠信也注意到:“英人自冈多(甘托克)起至江孜止,每隔相当距离即设驿馆一所,以利行旅,其经营西藏之计划

①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12-113.

② Edward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London: Vintage, 1997, p. 49.

③ Clements Markham, ed.,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New Delhi: Manjuri Publ., 1971.

④ 《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 吴忠信 赵守钰 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49页。

亦云密矣。”<sup>①</sup>

众多的贸易站、驿站和代表处是英国侵藏的主要据点,同时“一直是英国在中亚的前沿情报点,也是英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中心。”<sup>②</sup>英国以此迅速获取西藏的各类情报,如设在拉萨的德吉林卡的英国代表处。“德吉林卡成了展示外部世界的魅力和奇异事物的窗口。那些有权势的西藏人能参加英国人的聚会,也有了机会享受那些越过雪山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时尚和技术。英国人通过摄影和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个西藏访客,每周报告给甘托克的政治官员,最终这些报告会到达白金汉宫。这些报告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客人的名字、提供的食物和娱乐活动。这些聚会也让英国人有机会收集到各种最新的流言蜚语,例如谁会在拉萨得势或失宠,谁会来到或离开拉萨。”<sup>③</sup>除英印边境官员,探险者、旅行家、考察者、传教士、商人、士兵甚至印度间谍也为英国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收集提供着各类信息和情报。<sup>④</sup>西藏从一片“未知的”、“神秘的”土地,开始成为西方人能直接接触和获得信息的“真实存在”。

西藏与西方人的接近是帝国主义强行所致,这决定了西方人认识西藏时的单向性和扭曲性。英国学者阿兰认为,“19世纪的西藏探险与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权的崛起相伴相生。人们主要通过英属印度这个窗口来遥望西藏”。<sup>⑤</sup>通过“这个窗口”,西方人既了解到某些真实情况,也获得了大量错误的、甚至虚假的信息。“这个窗口”的控制者——英国,依据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目的,操控着信息的“输出”和“输入”。英国人把搜集到的信息和情报用于政治行动,又将很大一部分传播出去,成为西方人了解西藏的主要信息源。为了塑造“西藏独立”形象,英国的官方文件、学术研究、考察报告、西藏游记、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确立了一套明确系统的宣传标准、写作方式、传统词汇和术语,通过占霸权地位的文化系统在全球加以扩散和传播。

## (二) 英俄政治大博弈下的西藏问题

19世纪中期开始,英俄在中亚开始了被称为“大博弈”的战略性竞争。<sup>⑥</sup>这不

① 《吴忠信奉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1940年6月)》,第140页。

② Alex McKay, ed.,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p. 11.

③ Tsering Shakya, “Cities and Thrones and Powers: The British and the Tibetans in Lhasa, 1936-1947”, in Clare Harris and Tsering Shakya eds., *Seeing Lhasa*, p. 86.

④ 英国雇佣和培训印度当地土著人(pundits)探查西藏,参见 Derek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0; Jules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Stroud: Sutton Publ., 2006.

⑤ Charles Allen, *A Mountain in Tibet*,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2, p. 15.

⑥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Karl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仅是实力的竞争,也是智慧的较量。与在中国东部的公开、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相比,大博弈显示出更多的阴谋诡计。<sup>①</sup>英国的战略是阻止俄国势力南进,保证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这也是整个殖民帝国的中心任务。因为“到19世纪末,印度已成为英国甚至欧洲所拥有的最大、最可靠、最有利可图的一项殖民财产”。<sup>②</sup>这一战略决定了英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策略和目标。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有准确判断。1942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定了一份文件供蒋介石参考,认为:“英国一向只认中国对西藏名义上之宗主权,而阻止中国在西藏行使事实上之主权;同时暗中鼓励并多方援助西藏脱离中国,而事实上沦其为英国之势力范围。惟英国对藏之用意,恐视为缓冲地带,借以保卫印度,其次亦以防俄。……清末民初,西藏每视中英势力之消长而有所偏向。近30年来,暗受英方之鼓动,借口民族自决,趋向独立。”<sup>③</sup>

英国人也不隐讳自己的政策和目标。贝尔在1924年明确阐述道:“现在中国很虚弱,已不受西藏欢迎;俄国目前也毫无力量,尽管还可能回来;印度作为英联邦的一员,现在有了机会。我们已经赢得了西藏的友谊,西藏深信英国的实力。印度该如何利用这一机会呢?我们想让西藏成为印度北部的缓冲区。西藏控制着北部的广阔草原、中部和南部西藏,还与其他几个国家——他们都与英印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盟——共同把守着喜马拉雅。西藏是世界其他地区都羡慕的一块屏障。西藏渴望自由管理自己的事务,憎恨外来干涉。这是极为美妙的,因为这是最为有效的屏障。”<sup>④</sup>

英国要把西藏地区变为印度的屏障,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控制或干脆将其变为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但又为何不直接占领和吞并呢?贝尔透露:“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印度流亡,西藏愿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我与许多西藏部长会晤时,他们评论说,印度有理想的地位,使他不受外来侵略,内部不受干预。他们叹息着补充道:那也正是西藏渴望的。……即使是现在(1924年),不少有影响的西藏人依然渴望(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贝尔承认:“保护辽阔的西藏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我们没有再向喜马拉雅以北前进,显示了我们的信用和不垂涎西藏的土地。”<sup>⑤</sup>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英国殖民扩张的能力也已穷竭。吞并西藏,非其不愿,实是无力。退而求其次,他们的策略变为:

---

① [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②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133.

③ 《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1942年12月2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5/14,台北。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4页。

④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 246.

⑤ *Ibid.*, p. 47.

将中国的西藏地区扶植为一个独立的、对英印政府持友好政策(最好是依附于英印政府)的“西藏国”。这一策略既不需沉重的军事和经济负担,又能实现拱卫印度的战略目标。

英国人要按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为中国的西藏地区构建“代表国家身份特征的基本元素”。拥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英国人深知,这种“西藏独立国”的特征,既需要实际元素,也需要外部世界的承认和支持;既需要西藏人自己的独立意识,也需要西方公众在观念和心理上做出回应。英国的手段是多方面的:政治上,通过武装侵略和缓慢渗透,不断增强在西藏的影响力,不断削弱和排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社会和文化上,利用一切机会培植和诱导藏人尤其是上层人物的国家观念和独立倾向;观念和知识上,利用占霸权地位的文化和传播系统,渲染、鼓吹和制造出一个“西藏独立”的形象。

英国人在早期制造的“西藏独立”形象依然产生着巨大影响。这连当代的英国学者也不否认:“那些在西藏工作的英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创造了‘西藏独立国’这一强有力的历史形象。贝尔、黎吉生、古德等的著作,直到今天还强烈影响着学术和非学术的领域。”<sup>①</sup>当代的“西藏问题”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和观念上。“西藏独立”形象是帝国主义留给当代的殖民文化遗产。英国人制造这一虚假形象的手法娴熟隐蔽,“润物无声”,普通西方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很难辨别和抵抗。这种虚假形象一旦被接受,就变为“事实”,在西方的文化霸权支持下,具有了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惯性。它反过来会排斥真实信息或将其整合进“西藏独立”形象的认知框架中。当代许多西方人关注的并不是现实的西藏,而是一个虚幻的西藏,一个他们认为曾经存在过的、独立的、完美的、神话般的“香格里拉”。

一些英印殖民地官员在当代被视为西藏研究的权威,其作品成了经典。对支持“西藏独立”的人而言,这些经典也成了“活生生的证据”。因此,在阅读和利用英国早期各类西藏作品时,必须要时刻保持敏感性。尤其像荣赫鹏、贝尔、古德、黎吉生等人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英印殖民当局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又是学者。他们或者由西藏研究者变为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或者由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变为西藏研究者与“西藏通”。他们的研究和作品服务于英国的政治目的,为后人设置了重重陷阱,这是在阅读其作品时必须格外小心的。除了政治上批判其殖民侵略野心之外,还要对英国人的这些作品进行细致的基础性学术分析,破除各种虚假形象和观念,这样才能从文化与历史研究方面认清和消解西方人的“西藏情结”。这是国内学者刚刚开始且极为艰巨的一项学术任务。

<sup>①</sup> Michael Aris, “Forword,” in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p. viii.